

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综述

吴惠芳 饶 静

[摘 要] 文章对于我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综述了目前相关研究的主要观点,包括农村妇女留守原因、农业生产女性化现象、留守妇女的婚姻关系与心理状况、家庭决策与性别关系、子女教育、社会网络与自我发展几个方面。文章认为,目前的留守妇女研究存在界定模糊、理论构建不足、缺少对留守妇女多元性关注等问题,而且忽略了她们生活中重要的相关利益群体。

[关键词] 农村;留守妇女;劳动力流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进入城市的各行各业。然而,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体制还没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并没有给农民工提供可以实现“举家迁移”的条件;而农民工也因为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而实现整个家庭人口的转移,因此,在农民进城务工、实现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他们家庭的部分成员却被留在了农村,造就了农村独特的“留守人口”——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在这 3 个留守人口群体中,留守妇女可以说是负担最重、对农村发展影响最大,但受到的关注却最少的群体。留守妇女通常是指由于丈夫长期在外务工而留守家庭中的农村妇女,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同时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2000 年统计,有 2/3 的已婚农民工没有与他们的配偶生活在一起;而据《中国经济周刊》2006 年报道,我国农村目前留守妇女人数已达到 4 700 万。尽管这可能是一个不准确的数字,但农村中大量留守妇女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2005 年 11 月,《半月谈》发表题为《农村留守妇女心头有“三座山”》的文章,描述了留守妇女“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特点,可以说是对留守妇女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因此,本研究对我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以期总结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的相关成果和观点,为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留守妇女问题提供思路。

一、农村妇女留守原因

农村留守妇女这一群体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农民工既不能在城市享受应有的身份待遇,又因高生活成本和高教育成本、低福利而不能和家庭成员一起转移;其次,农村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与“男强女弱”的性别观念导致两性之中的男性更倾向于外出务工;最后是农村家庭将满足家庭生存理性与经济和社会理性任务进行角色分工的理性决策结果^[1]。除了这些原因,也有学者认为妇女自身文化素质低是其留守农村的原因之一^[2-3]。

农村妇女选择留守还是外出,一方面在于她们对农村与城镇之间比较优势的认识与把握;另一方面在于农村社会伦理的制约。在丈夫外出的前提下,赡养老人与照看小孩的责任就全部落到妇

[收稿日期] 2009-02-25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6-0118)的支持。

[作者简介] 吴惠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博士;

饶 静,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博士,邮编:100193。

女的肩上。换言之,尽管农村妇女生活在能够促使她们外出的大环境下,但在讲究理治、讲求孝道与责任的乡土差序格局里,部分农村妇女被迫留守。而曾经外出务工的农村妇女回流成为留守妇女,除了生理原因之外,多是与尽孝道与尽社会抚育责任相关,前者回流的时间较短,而后者回流时间一般较长。但只要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始终存着外出的冲动^[4]。

二、农业女性化现象

对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留守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学术界最早关注的是“农业女性化”现象。高小贤较早指出这种“农业女性化”的趋势,她认为,农业较低的收益致使以农业为主的妇女贡献也在下降;同时农业作为女性主业,并不意味女性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女人干,男人管”,权力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妇女主要扮演无技能的劳动力角色;因此,与其说农业女性化,不如说女性农业化^[5]。而孟宪范则强调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贡献,肯定其对妇女地位改善的积极意义^[6]。一些研究者从家庭作为“利益整体”角度出发,强调性别分工的合理性^[7-9]。李新然和方子节的研究更关注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化,农村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正在持续加大。这一趋势在给农业和农村发展带来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包括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下降、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技术水平和管理工作下降、农业经营决策与日常管理相分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难度加大、不利于对农民子女的教育与培养,因此建议对有关理论与政策进行改革^[10]。

在农业生产女性化现象背后,最受关注的问题是留守妇女劳动负担沉重、劳动强度大的问题^[11]。由于承担新的生产和生活任务,留守妇女群体中出现了“角色替代”和“角色取舍”,带来了角色分化现象;这要取决于其家庭支持、经济条件和留守妇女的自我意识。大部分留守妇女承担了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的角色,但很多人并不在农业生产上花费很多精力,广种薄收的现象非常普遍。在角色取舍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留守妇女都把重心放在家庭角色上,完成传统赋予她们的责任和义务;但少部分妇女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和社区公共事务,有的甚至成为家庭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12]。

三、留守妇女的婚姻关系与心理状况

留守妻子的婚姻遭遇很多难题,可能出现不和谐甚至破裂^{[13-14][15][122]}。另一方面,丈夫和妻子之间出现了城市化不同步的现象,不仅表现在信息、技术和知识的不同,价值观、思维方式等也都出现了不同,这种不同步是引起婚姻变化的直接因素^[16-17]。还有些研究认为,留守妇女婚姻脆弱,维权困难^[18],经常遭遇情感沙漠,婚姻频亮“红灯”^[11]。此外,农村留守妇女对自己的婚姻有危机感。一方外出打工导致婚姻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有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同时留守妇女和配偶不经常联系,有的甚至不联系,双方的交流无从谈起,导致了留守妇女对婚姻有很深的不安定感,甚至出现生活无望的想法。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其收入对于大部分留守的农村女性来说是未知数,一旦婚姻出现问题,妇女的财产权益无法保障。而有些留守妇女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或考虑到老人、孩子而不愿离婚,成为她们心理压力以及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19]。陈利认为,留守妇女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却无人可以倾诉,缺少男性的关怀,既担心被丈夫抛弃,又担心被丈夫怀疑,这种种压力使其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又没有正常的方式释放压力,长年累月将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20]。

“男工女守”分工模式的直接后果是夫妻共享时间的减少和夫妻的异质性增强。在夫妻分居生活中,他们各自受到不同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与不同的人群交往。丈夫处于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变化的生活环境中,而妻子则处于相对静态的、封闭的、少有变化的生活状态之中。社会化

客观条件的差异造成了二人在知识、信息、技术、社会关系、生活态度等方面的差异,这使得夫妻二人的异质性增强,直接影响到夫妻关系的变化和婚姻的质量,有的还导致夫妻感情淡漠、家庭解体^[21]。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夫妻分居生活本身对夫妻感情并没有造成普遍的负面作用,但是农民工婚姻较之其他农民家庭而言却隐含着更多的不稳定因子^[22]。有调查发现,在有些家庭,丈夫外出打工,双方因两地分居的思念而增进夫妻的感情,有“久别胜新婚”的效应^{[15][22]}。也有研究者认为,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农民工家庭来说,分离式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影响夫妻感情的主要因素,但婚姻危机已出现在少数家庭,且与丈夫的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变化有高度相关性^[23]。

农村已婚男性外出打工,由于受经济条件和工作性质的影响,一般一去半年、一年甚至是几年才能回家团聚一次。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农村留守妇女长年独守空房,再加上农村缺乏必要的文化娱乐与交流,因而她们的性需求只能长期抑制。特别是对于年轻女性,这种压抑会对其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消极的影响,有的甚至发生生理病变或性冷淡,进而影响夫妻性生活,为家庭变故埋下祸根。与此同时,留守妇女在农村特有的熟人社会条件下,还时不时地遭受骚扰之苦,甚至容忍有些男性把自己作为性侵犯的对象。在极度困难和空虚的条件下,有的留守妇女甚至经不住男性的诱惑和骚扰而屈从^[14]。留守妇女普遍缺乏安全感,饱受性压抑之苦^[1]。

留守妇女并没有因为担负起农业生产的重任而减少了她原有的“内”角色所承担的家务劳动重任,而劳动强度的加大和承担多种角色的责任对她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24,18]。农村社会原本就缺乏有利于妇女休闲的公共设施,加之农业职业病以及妇科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留守妇女身心健康得不到保障,进而危及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3]。

有心理学研究者采用量化的心理量表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农村“留守女性”在量表中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精神病性6个因子上的分值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表现突出的是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和抑郁;这说明她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而影响农村“留守女性”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因素也有农村女性自身因素,既有生理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高强度的劳动强化了躯体化症状,生理需求得不到正常满足,人际交往狭窄,情感无从寄托,家庭稳定性遭到破坏,缺乏安全感^[25]。

四、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与性别关系

随着大量男性农民流入城市,留守妇女的家庭角色开始从次要角色向主要角色转变,即家庭事务决策权从男性手中转向女性,留守妇女成为家庭中的主要决策人。然而,新主角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男性在家庭中主角地位的丧失,男性仍然是家庭的主要角色,家庭中出现了两个主角并存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家庭决策的方式。丈夫和妻子同时作为家庭主角,在分工上仍旧存在着差别,妇女作为主角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家庭生活和家庭开支方面;而在家庭生产投入方面,特别是一些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的领域,还是以丈夫决策为主^{[16][3]84}。孙琼如通过对留守妻子及其丈夫对家庭资源的拥有和控制程度以及自主程度,和对家庭重大事务决策的发言权的分析也认为,农村中“男工女耕”的分工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而只是再现了性别不平等关系^[24]。留守妇女在家庭权利结构中的地位取决于妇女的经济收入能力、个人素质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而与留守妇女承担的家庭责任的量的相关性不大^[22]。因此,在家庭中,留守妇女分享不到实际的权利,起到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她们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丈夫仍然是“管理者”和“指挥者”,而留守妻子只是“生产者”和“配合者”^{[24][15]205}。

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过程中,传统的乡土性别结构被重塑。一方面,守土妇女依赖心理减弱,独立决策意识增强。丈夫出外打工,使守土的妇女承担起原来在社区和家庭中由她们丈夫承担的责任。丈夫外出打工引起了劳动分工的变化,进而增加了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另一方面,“男耕女织”的和谐分工模式被打破,农业女性化加重了女性的负担,从而使其患病几率增大,但使得女

性为家庭创造的价值显性化;然而,在男性能够挣到足够的收入的情况下,出现了将地转租给他人代种的现象,从而使女性也脱离了农业活动,全部投入到家庭生活中,这虽然减轻了女性的负担,但也有可能使女性比以前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男性,弱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26]。蒋美华等的研究也认为,留守妻子在生产劳作与家庭负担的双重挤压下,在情感眷恋与经济依附的双重困惑下生活着,这种现象在整体上影响着她们与其外出务工丈夫平地位的建构^[27]。

五、留守妇女的子女教育

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多种角色集于一身,导致子女教育欠缺。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中,父母角色都由母亲承担,家庭角色的缺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产生巨大影响。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有限,难以承担教育子女成材的承担,加之繁重的农活和家务让留守妇女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教孩子,一旦孩子犯了错,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对策的人;因此,很多留守妇女无法实施有效的管教,只能让孩子顺其自然地成长^[1,3,18]。

一些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文献讨论了父母双方外出务工与单方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差异。张德乾、仰和芝的研究^[28]表明,留守儿童交往问题受父母谁在外打工、打工时间和回家时间间隔长短的影响。父母都在外打工比单纯父或母亲一方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报告出更多的孤独与郁闷(孤独、郁闷、无乐、无交流)、亲情梦和需求缺失,母亲在外打工比父亲在外打工报告出更多的亲情梦;因此,该研究认为母亲是儿童的情感支柱。另一方面,母亲在外打工时间的长短对留守儿童的学习辅导缺失有显著影响,因此该研究认为儿童的学习辅导也主要依赖于母亲。

华中师范大学周宗奎等的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务工后表现比较突出的心理问题主要有情绪问题、交往问题和自卑问题等,父母都在家的儿童的人际关系显著地好于单亲及双亲都外出打工的孩子,而单亲外出打工的孩子的自信心显著强于双亲外出打工的孩子^[29]。于慎鸿认为,留守儿童的单亲家庭教育力不从心。只有父母一方在家的家庭中,由于父亲或母亲所要承担的家务较多,无暇顾及儿童的情绪和情感变化,且一些儿童为帮助监护人做家务等会耽误学业。^[30]但这些研究并没有明确区分单亲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指的是父亲还是母亲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

六、留守妇女的社会网络与自我发展

留守妇女的社会流动性比以往降低。留守妇女承担的多项劳动和家庭负担的加重大大减少了她们的闲暇时间,使得她们常常在自己的村庄里忙碌而无暇走亲戚或到县城等远一些的地方购物,因此,她们被迫减少流动的行为,造成留守妇女相对社会流动性降低^[13]。在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方面,家庭成员、亲戚、邻里传统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支持关系,仍主导着社会支持体系,而具现代性的朋友关系则次之,母系血缘关系在农村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在日益加强^[12]。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性别差异。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留守妻子,在社会互动中为自身及其家庭创造和积累了更多的社会资本,维持甚至提高了自身及其家庭在乡村社会中的结构位置与网络位置,使半流动家庭作为社会网络中的节点一如继往地发挥作用,从而维护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她们代表家庭的对外联系也有利于其自身地位的提高及其自我发展。在社会资本存量增加的同时,留守妻子利用社会支持网络和使用社会资本的行为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丈夫外出后,留守妻子的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主要由婆家转向娘家,由血缘亲戚转向邻居好友^[31]。

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活方式因“留守”而被改变。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消耗了留守妇女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限制了她们的发展空间^{[15]203},进而影响了其身心健康,阻碍了她们的自身发展^[24]。同时,留守女性也反映劳动之余的休闲娱乐活动内容单调无味,常感到寂寞^[19],娱乐生活单调,精神匮乏^[18]。妇女本来在这个社会中就属于弱势群体,而“留守妇女”大部分文化程度偏低、

能力偏弱、维权意识淡薄,所以她们更是弱势加弱势的双重弱势群体^[32]。周庆行等认为,妇女留守农村现象反映在现代化进程中男性总是先于女性受益,而妇女却面对发展权利被剥夺;农村公共政策缺乏明显的性别意识,没有把农村妇女的发展指标纳入政策考虑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经济状况允许的地方或者政府公共部门,缺乏农村妇女发展基金,与农村妇女相关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村妇女心理与生理健康长期得不到保障,这必然不利于农村留守妇女的全面发展^[3]。马桂兰讨论了回族留守妇女在宗教文化影响下的留守生活。她认为,尽管回族留守妇女在保证家庭稳定的过程中体现了自身的价值,重塑了自己在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在农村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生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留守妇女的经济价值被隐现,所以她们对婚姻和自我的期望值不是很高,因而发展欲望不强,缺乏社会交际,思想转变难度很大。传统身份、形象、性别的偏见成为回族留守妇女自身发展的巨大障碍^[33]。

在参与新农村建设方面,有研究者认为留守妇女普遍存在自身素质低、市场应对能力差、政治参与意识弱的问题^[34]。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缘于男性主要劳动力的相对缺位,留守妇女被推向了建设的前沿,她们既主内,又主外。通过对新的角色的体验她们认识到,原有的自我认识已经无法适应新的要求,并开始逐渐改变原有的自我认知,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而对于自身的角色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积极性情绪^[35]。

七、文献评论

从研究文献的数量和涉及期刊类别的广泛性来看,农村留守妇女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以及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相对滞后,留守妇女现象已经出现。然而,仅在最近的两三年,留守妇女问题才受到关注,比留守妇女现象出现时间滞后了20年左右。同时,已有的留守妇女研究文献仍存在诸多不足和遗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留守妇女群体的界定来看,目前仍没有一个清晰的群体概念,现有研究只是笼统地将丈夫外出务工、自己留守家乡的妇女划为留守妇女,但显然丈夫在外务工时间、地点和回家频率对留守妇女生活影响巨大。(2)从研究内容来看,大多数关于留守妇女的研究仍停留在一般化的、个别的、泛泛的、心得体会式的主观讨论层面,对留守妇女的生活特征进行一般性的描述,如留守妇女的生活和劳动负担、心理压力、家庭角色转变、婚姻关系、性压抑问题等,而有深度的、有经验数据支持进行分析的较少,理论建设更显不足。(3)从研究方法看,已有研究主要采用抽取某一地区或社区样本进行研究,缺乏对不同地区进行系统深入调查的一手资料收集工作;或者只利用二手资料进行分析,而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持。有些研究结论是根据某一特殊地区或特殊案例得出的,容易以偏概全,造成对留守妇女总体状况的认识和了解偏差。(4)大部分研究忽略了留守妇女群体因年龄、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个人经历以及丈夫务工情况等因素造成的多元性特征,仅描述了她们具备的一些同质性特征。(5)从研究对象来看,目前的研究仅就留守妇女研究留守妇女,忽略了在留守妇女生活中的其他相关群体,尤其是与她们生活密不可分的子女(留守儿童)、外出务工的丈夫,这些相关群体恰恰构成了留守妇女最重要的生活世界,并且影响着她们对生活的感受。

[参考文献]

- [1] 王菲. 留守妇女:农村上演新织女故事[J]. 中国社会导刊, 2007(4): 26-28.
- [2] 康芳民. 构建和谐农村的根本——对留守妇女问题的思考[J]. 新西部, 2008(2): 27-28.
- [3] 周福林. 我国留守家庭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6.
- [4] 周庆行, 曾智, 聂增梅. 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来自重庆市的调查[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7(1): 63-66.
- [5] 高小贤. 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J]. 社会学研究, 1994(2): 83-90.
- [6] 孟宪范.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中国农村妇女[J]. 社会科学战线, 1993(4): 23-25.
- [7] 杜鹰, 白南生. 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40-56.

- [8] 蔡昉. 中国流动人口问题[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152-159.
- [9] 蔡昉. 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30.
- [10] 李新然,方子节. 试论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J]. 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2):88-90.
- [11] 吴旭. 关于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现状问题的综述[J]. 法制与社会,2008(1)(上):234.
- [12] 范丽娟,程一. 留守女:现代农村社区的一个新群体[J].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9-13.
- [13] 余显亚. 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留守人口的影响[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6):31-34.
- [14] 鄢木秀. 留守的女人困惑的心——农村留守妇女权益的缺失和保护[J]. 重庆社会工作职业学院学报,2005(4):7-9.
- [15] 郑真真,解振明. 人口流动与农村妇女发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2.
- [16] 罗忆源,柴定红. 半流动家庭中留守妇女的家庭和婚姻状况探析[J]. 探索与争鸣:理论月刊,2004(3):103-104.
- [17] 李柳红,等. 关注农村留守女性 促进和谐社会构建[J]. 社会,2005(5):57-58.
- [18] 黄敏. 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及对策思考[J]. 安徽农学通报,2007(2):42,63.
- [19] 安徽省妇联. 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情况调查[J]. 中国妇运,2006(7):24-26.
- [20] 陈利. 农村留守妇女的精神压力和感情危机[J]. 甘肃农业,2006(11):85.
- [21] 项丽萍. 农村留守女:一个值得关注的弱势群体[J]. 广西社会科学,2006(1):176-180.
- [22] 魏翠妮. 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C].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南京师范大学,2006.
- [23] 周伟文,严晓萍,刘中一. 生存在边缘——流动家庭[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72.
- [24] 孙琼如. 农村留守妻子家庭地位的性别考察[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6(2):29-33.
- [25] 朱桂琴. 农村“留守女性”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思考[J]. 天中学刊,2006(8):135-137.
- [26] 李小云. “守土与离乡”中的性别失衡[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7-19.
- [27] 蒋美华,周焱. 农村留守妻子现象的社会性别分析[J]. 社会工作,2007(3):48-49.
- [28] 张德乾,仰和芝. 亲情呵护缺失. 聚焦农村留守儿童交往[J]. 中国统计,2007(6):15-16.
- [29] 周宗奎,孙晓军,刘亚,等.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71-77.
- [30] 于慎鸿.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探析[J]. 中州学刊,2006(3):128-131.
- [31] 刘文明. 留守妻子与社会和谐: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J]. 社会科学,2007(3):70-74.
- [32] 邱秀珍,肖芳艳,刘行一. “留守妇女”的生存困境及其对策[J].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7(1):32-33.
- [33] 马桂兰. 社会转型时期回族留守妇女的文化定位问题[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60-63.
- [34] 岳雷波. 农村留守妇女问题与新农村建设[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25-26.
- [35] 覃金玲.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留守妇女的角色调适——以咸丰县官坝苗寨为例[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19-22.

Research Review on Left-behind Women

Wu Huifang Rao Jing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ed recent researches on left-behind women in rural China, summarized their findings in the aspects of reasons for being left behind, the agricultural feminization, marital relationship change and women's mental status, family decision and gender relationship, children education, social network and self-development. It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es had vague definition of left-behind women and did not touch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multianalysis and stakeholder analysis problems.

Key words Left-behind women; Labor migration

(责任编辑:连丽霞)